

# 美国对华经贸脱钩与去风险：影响评估与应对思路

赵春磊<sup>1</sup>，刘子林<sup>2</sup>

(1. 烟台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东烟台 255000; 2.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2206)

**摘要:** 从“脱钩”到“去风险”，美国对华政策并未发生根本逆转，其实质依旧是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维护自身全球霸权。通过梳理美国对华举措，发现美国重点在经济、科技和金融领域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这导致了中美进出口贸易联系弱化，市场多元化趋势调整加速。在产业链层面，中美间面临“断链”风险，具体表现为中间品贸易依赖性下降，供应链外迁加剧，制造业互补关系减弱，供应链重组加速推进，尤其是在高科技行业，“断链”态势尤为显著。同时，两国人文交流受到限制，且双向投资亦显颓势。为此，中国需通过协商谈判管控分歧，拓展中美合作空间。同时，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并推动国内市场建设，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在此基础上，中国应逐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并不断提升海内外投资水平。

**关键词:** 脱钩；去风险；对华政策；中美经贸

**中图分类号:** F27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12-0315-11

自中美建交以来，基于资源优势和经济战略互补，两国在贸易、科技、投资等领域联系紧密性不断加强。然而，2001年后，中国借“入世”之机迅速崛起，中美对位经济差距逐步缩小。数据显示，2001—2023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已由12.7%上升至65%<sup>①</sup>。源于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迫切担忧，尤其是在技术、供应链等领域的激烈竞争，美国重新审视对华关系，并逐步转变对华战略认知。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脱钩”(de-coupling)成为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战略。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重构对华政策思路，但整体延续了“脱钩”政策的核心逻辑，并更加聚焦于“去风险”(de-risking)，注重在关键领域实行更为精细化的“脱钩断链”，构筑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经历从“脱钩”到“去风险”的转变，引发国内外学者对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应对策略的关注。蔡宏波等<sup>[1]</sup>指出，中美“脱钩”旨在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一策略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半导体、矿物和电子等关键性行业。Ryan<sup>[2]</sup>聚焦于美国对于华为的制裁，进一步揭示了中美“脱钩”使得高科技行业面临“断链”的风险。Hou和Rui<sup>[3]</sup>从金融领域

出发，详细剖析中国银行与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脱钩”的过程及其决定性因素，为金融领域提供了实证支持。渠慎宁和杨丹辉<sup>[4]</sup>对于中美“脱钩”的风险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中国专利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品和中间品受到较大的冲击，中美科技合作遭到严重挤压，而在金融领域的风险总体上可控。

基于上述文献可见，国内外学者从贸易、科技、金融等多个维度分析美国的影响，而对于中美经贸“脱钩”与“去风险”的具体政策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有待深入。如今，特朗普政府的再次上台进一步增加了中美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从美国政府对华举措来看，中美战略竞争已成常态，中美摩擦方兴未艾，这必然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一系列连带影响。美国对华经贸“脱钩”与“去风险”的政策实质是什么？相关政策措施有哪些？对中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又应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准确把握美国对华“脱钩”与“去风险”政策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美国对华经贸脱钩与去风险的政策实质

2015年，美国国内掀起一场“自1989年以来规模最大、也最深刻的”对华政策大辩论<sup>[5]</sup>，辩论聚焦于美国长期对华接触策略是否改变了中国，以及该

**收稿日期:** 2024-12-23

**作者简介:** 赵春磊(1995—)，女，山东潍坊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美贸易；刘子林(1998—)，男，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美贸易。

<sup>①</sup>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

策略是否使中国达到预期中的“民主国家”地位。经历辩论后,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数十年的“接触”政策使中国从现有国际体系中获益良多,但却未能改变中国<sup>[6]</sup>,美国对华政策已告失败。对此,美国各界强烈呼吁调整对华政策,而如何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尚未达成共识,但形成一种以竞争和限制为基调的对华政治态度。“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观点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将发生变化。

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和霸权主义思潮相结合的大背景下,秉持“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强调“大国竞争”战略的特朗普入主白宫,开启了以单边主义为特征,维护美国霸权为目的的全球战略。在“美国利益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执政目标下,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其经济利益的竞争者、全球影响力的削弱者及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宣称要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并重新塑造对华关系<sup>[7]</sup>。2017年末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sup>[8]</sup>,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以“贸易逆差”为名,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争端。此后,特朗普政府不断扩大对华制裁范围,持续升级对华制裁政策工具,同时极力游说、拉拢盟友,以形成对华全面围堵与打压。至此,“脱钩”政策成为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战略。

特朗普政府对华“脱钩”政策旨在通过单边或多边等手段,在经济、科技、金融等领域削弱或中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同时在短期内通过对抗手段迫使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以达到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脱钩”政策倾向于在经济、科技、金融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切割,强调两国间的割裂,更加突出与中国的“对抗性”。

尽管“脱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但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度演变,美国政界与学界对“脱钩”战略的审视与反思日益增多,普遍认为美国与中国的“脱钩”过程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反噬作用较大<sup>[9]</sup>，“脱钩”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究其原因:首先,尽管美国政府在经济、科技、金融等领域对中国进行长期打压,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受到有效压制,反而推动中国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其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且与美国联

系紧密,与中国“完全脱钩”将导致美国经济成本过高,有损于美国自身利益;最后,欧洲和日本等一众盟友对“脱钩”这一强硬措辞持有警惕态度,“脱钩”政策可能会导致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利益分歧加剧。因此,美国政府逐渐聚焦于中美如何“脱钩”,而不是是否“脱钩”。

拜登政府执政后,调整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脱钩”战略,但遏制中国发展的核心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总体基调基本未变。2021年2月,拜登称美国将面对来自“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中国的竞争<sup>[10]</sup>。3月,《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当前唯一有潜力挑战国际体系的国家,强硬遏制中国的总体战略不会改变”<sup>[11]</sup>。在此基础上,拜登政府持续聚焦经贸、科技、金融等关键领域,采取诸多遏制手段,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打压力度,意图阻止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sup>[12]</sup>。虽然拜登政府并未放弃特朗普政府的“脱钩”政策,但也逐渐意识到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因此,美国政府在“脱钩”的表述和姿态上做出了相应的回调。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愿景时首次提出“再挂钩”(re-coupling)概念,并表示,美国将努力在不同基础上与中国“再挂钩”,而非“脱钩”<sup>[13]</sup>。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外交政策演讲中再次明确提出对华政策“应在竞争的时候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的“三轨战略”<sup>[14]</sup>。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中逐渐转变对华“全面脱钩”态势,而是在竞争、合作、对抗中寻求对华新平衡。

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在中欧关系演讲中首次提出“去风险”(de-risking)概念,他表示,“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欧洲不应该用‘脱钩’来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而应当通过‘去风险’来维持和中国的关系”<sup>[15]</sup>。随后该政策理念得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呼应,声称“美国将用‘小院高墙’的模式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但不实施全面的技术封锁,同时以‘去风险’和‘多元化’为目标,避免‘脱钩’的发生,继续保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sup>[16]</sup>。5月20日,七国集团(G7)发布的《领导人公报》将对华政策口径正式统一为“去风险”,并明确声称“要对中国‘去风险’,而不是‘脱钩’”<sup>[17]</sup>。5月3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强调美欧对华不寻求对抗、冷战或

“脱钩”,而是“去风险”<sup>[18]</sup>。

如今,“去风险”一词已取代“脱钩”成为美国用来表述对华政策的崭新术语。美国之所以在对华关系上用“去风险”取代“脱钩”,形成所谓的话术转变,其关键动机在于:第一,与特朗普政府“完全脱钩”政策相割离。特朗普政府的“脱钩”政策在国际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众多国家认为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了全球贸易体系。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去风险”政策提升美国国际形象,寻求与其他国家在应对中国问题上的共识。第二,减少对华“脱钩”的经济成本。当前,中美经济联系紧密,与中国“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想要以较低的经济损失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实现与中国的长期竞合。第三,缓解国内民众情绪。“脱钩”政策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进一步影响到美国消费和就业市场,企业和民众对“脱钩”政策反对声音加大。美国试图通过转变政策话语来安抚国内民众情绪,缓解政治压力。第四,地缘政治的考量。拜登政府意识到,面对中国的崛起,单纯的对抗策略无法形成有效的应对。因此,拜登政府希望通过转变“脱钩”策略,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并建立西方国家统一战线加强对华施压。第五,概念内涵较为宽泛。“去风险”这一概念并未对风险领域做出限定约束,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自行评估风险领域,采取更为合适的“去风险”政策,从而更加符合美国政府自身利益。

在“去风险”战略框架下,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其国家安全、经济稳定和科技领先地位的主要威胁,因此,对华“去风险”聚焦消除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在此框架下,美国不断调整政策工具,试图通过增加对关键行业的战略投资强化其国内科技创新能力、借由“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及“近岸外包”(near-shoring)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协同盟友建立针对中国的联盟网络、以“小院高墙”的方式加大对核心科技的保护等举措,以期在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基础上,通过联盟化、精细化手段,管理和降低中国所带来的“风险”。

在这一系列布局中,对中国进行技术遏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拜登政府认为,技术领先优势既关乎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也关乎维护国家安全<sup>[19]</sup>。因此,美国政府企图通过采取“小院高墙”等限制措施,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所谓“小院”,指

的是美国自身具有优势但中国匮乏的领域,而“高墙”意味着对上述领域进行严格保护。因此,“小院高墙”即指在关键领域,通过建立严格的管控措施,防止技术外流,同时不完全阻断中美间的经济与科技交流,强调一种有限但有效的管制策略。如今,从美国相关举措来看,“小院”范围逐步扩大,不仅涵盖传统科技产业技术,还涉及新兴技术领域,相关“高墙”举措也在不断升级。这表明,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将随着中美科技的发展和政府的即时政策而动态调整<sup>[20]</sup>。

相较于“脱钩”,“去风险”虽然在语言上弱化了对华针对性,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转变。事实上,美国对华“去风险”的目的并不是全面切断与中国的联系,而是在保持与中国接触的基础上,实现对华精准“脱钩”。从政策举措可以看出,“去风险”只是“脱钩”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其真实含义是美国有选择性地、更加精细化地对华“脱钩”,甚至在部分领域强化了对华“脱钩”的态势,本质上并没有转变美国对华“对抗、竞争”的理念,只是更偏向于在共存中竞争。从“脱钩”转向“去风险”,尽管措辞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其政策实质未变,核心本质未变。名为“去风险”,实为“去中国化”,甚至是“去全球化”。

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两者都体现了对华“对抗性”,其核心目的均为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脚步,以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从表面上来看是中美两国的经济之争、科技之争,但实际上是发展模式之争、国际秩序之争、全球地位之争,即陷入守成大国与挑战大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 2 美国对华经贸脱钩和去风险举措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由“脱钩”转向“去风险”,“脱钩”范围已逐步外溢到多个领域,包括经济领域、科技领域、金融领域等,其相应举措逐步精细化。

### 2.1 经济领域遏制

#### 2.1.1 强征高额关税

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301报告》,认定中国技术转让、许可限制、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存在不公正做法。依据“301调查”,美国政府先后五次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25%的关税,覆盖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等诸多领域,涉及金额高达5500亿美元。

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针对部分商品豁免惩罚性关税,但大部分商品仍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的高关税政策,甚至意欲对部分商品提高关税。2022

年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进口光伏电池组件的“201条关税”实施期限延长四年。2024年5月,USTR发布“301行动思念复审报告”,裁定维持对中国大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并大幅提高半导体、电动汽车等14类产品的关税。

### 2.1.2 构筑排华联盟

为加强对中国经济束缚,美国联合盟友在供应链等方面构筑排华联盟,包括重塑“印太战略”、推行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建立“蓝太平洋伙伴”(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 PBP)和“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MSP),以加强对华“脱钩断链”。此外,美国政府成立“白宫强化供应链韧性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依托伙伴国家强化全球供应链,抵消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力。2024年4月11日,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吕宋走廊”(the Luzon Corridor),意欲打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 2.2 科技领域打压

作为对华“脱钩”的主轴,美国采取管制、禁售、断供等手段对中国诸多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以弱化中国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 2.2.1 出口管制

一方面,美国频繁使用《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ECRA)、《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商业管制清单》(commerce control list, CCL)等政策性工具对人工智能、无人机、计算机等诸多新兴领域加以限制,严格控制对华出口。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实体清单(entity list)、未经核实清单(unverified list)、军事最终用户清单(military end user, MEU)等方式对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的企业进行管制。从中兴通讯、华为、科大讯飞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被加入管制清单的企业和机构禁止进入美国市场,并禁止美国企业购买相关企业的股票以及向相关企业出口产品及零部件等。如今,美国通正逐步扩大制裁范围,持续将相关中国企业列入管制清单。截至2024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共将136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管制清单。

### 2.2.2 市场准入限制

美国政府在通信服务等领域采取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措施。2021年3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

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将华为、中兴等五家中国企业纳入设备服务清单,并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为由禁止上述企业在美销售设备。2021年3月17日,FCC撤销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太平洋网络公司在美提供电信服务的许可,并吊销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美国的运营权。在此之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又陆续将中国通信企业太平洋网络与其全资子公司信通、中国联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信通列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清单之中。此外,美国国务院还公布“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方案,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为由,将华为、百度、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排除出美国市场。

### 2.2.3 政府采购限制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各联邦政府以及承包商采购被列入管制清单的中国商品。《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the Fiscal 201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禁止联邦政府部门采购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Secure and Trus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ct)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和维护“威胁国家安全”的通信设备。此外,国会永久禁止美国国防部购买拥有任何中国部件的无人机,并在《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the Fiscal 2024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进一步禁止美国国防部购买宁德时代、比亚迪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生产的电池。

### 2.2.4 人才交流限制

为限制中美科技交流合作,美国政府采取多种举措阻断中国留学生和科研人员赴美交流通道。美国政府不仅以中国留学生窃取美国敏感技术为由暂停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而且不断调整签证政策,多次缩减并拒绝向攻读科技、工程、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专业的留学生发放签证。除了调整签证政策,美国司法部还启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重点针对在美实验室和高校的科研工作者,以排除来自中国的“安全技术威胁”。此外,《2021创新与竞争法案》(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2021)明确禁止美国研究人员参加中国政府的人才招聘计划。

### 2.2.5 科技合作限制

为挤压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空间,美国联合盟友加强在技术、信息等领域的合作。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针对5G、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进行技术

封锁,企图建立地缘经济和地缘科技的“抗中联盟”<sup>[21]</sup>。《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意图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与盟友开展合作,共享技术,对抗来自中国技术创新的竞争力。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意图推动关键技术多边出口管制,遏制中国产业升级进程。美国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组成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意图通过加强芯片产业合作,抗衡中国大陆。同时,还以美国为首签订的《互联网未来宣言》,以强化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霸权地位。

#### 2.2.6 本土科技扶持

拜登政府宣称,应对全球性风险的关键在于“提升美国自身实力”<sup>[22]</sup>,“通过加大对研究开发、基础计算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投资,确保美国技术创新优势”<sup>[23]</sup>。因此,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以保护美国的技术创新和科技领导力。2021年,美国政府相继出台《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 EFA)、《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及《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计划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提供巨额补贴,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2022年,美国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进一步对半导体产业进行补贴,以改善美国供应链。此外,为实现关键科技供应链本土化,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激励等措施,推动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回流美国,以增强国内产业链韧性。例如,《芯片与科学法案》将为半导体企业在美投资建厂提供补贴,并为上述企业额外提供税收减免。《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则重点规划了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和税收减免。

### 2.3 金融领域限制

#### 2.3.1 中国赴美投资限制

为了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切断中国企业通过美国资本市场实现发展的通道,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外资审查力度。2018年8月,《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以严格的审查和限制政策阻止中国企业收购美国的股权和资产。同时,该法案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的审查权限,以确保更有效审查外国企业赴美投资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 HFCAA)禁止三年内未遵守美国审计规则企业在

美上市,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腾讯等大型企业不断从美国摘牌退市。此外,美国还对中国企业并购美国科技企业持谨慎态度。截至今日,多家中国企业的并购方案因未能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而暂停。

#### 2.3.2 美国企业对华投资限制

在收紧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渠道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对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加以限制。一方面,限定美国企业对华投资领域。2020年6月,美国政府公布“中国涉军企业”清单,禁止美国企业投资被认定为中国涉军企业发行的债券及金融衍生品。2023年6月,《芯片法案》要求受补贴企业未来十年内禁止在中国扩大产能及相关技术转让,而《关于解决美国对受关注国家的特定国家安全技术及产品投资的行政令》进一步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另一方面,提高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透明度。2023年7月,《对外投资透明度法案》的签署要求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前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提出申请。《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修正案》要求美国企业向联邦政府通报对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投资状况。《拟议规则制定预先通知》(Advanced Notice of Proposed Rule Making, ANPRM)则进一步确保美国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均处于财政部监管之下。

### 3 美国对华经贸脱钩与去风险化影响评估

#### 3.1 中美进出口贸易联系弱化,市场多元化趋势调整加速

美国对华“脱钩”与“去风险”政策最直接的影响首先反映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表1和表2)。从货物贸易来看,中美双方依托各自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双方贸易互补性得到充分发挥。2012—2018年,中美两国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和中国自美进口总额均呈现上升趋势,美国所占中国市场份额也大幅增长。然而,美国对华“脱钩”与“去风险”政策中断了中美两国双边贸易稳步增长的状态。一方面,2019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总额、对美出口总额和自美进口总额虽然呈现“断崖式”下降,但2020年之后均实现大幅增长。与此同时,2023年中国的贸易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较2018年增加了30.36%、35.93%和23.40%。另一方面,美国所占中国贸易总额、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比例均显著下降。其中,中国对美国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国出口与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贸易总额、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从2018年的

表1 2012—2023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金额与美国所占贸易比例

年份	中国与美国贸易额/ 亿美元	贸易额占比/ %	中国向美国出口额/ 亿美元	出口额占比/ %	中国自美国进口额/ 亿美元	进口额占比/ %
2012	4 862.04	13.06	3 524.38	17.20	1 337.66	7.98
2013	5 224.59	13.06	3 690.64	16.71	1 533.95	8.56
2014	5 571.64	13.40	3 970.99	16.95	1 600.65	8.82
2015	5 586.72	14.66	4 099.79	18.03	1 486.93	9.68
2016	5 207.98	14.64	3 856.78	18.39	1 351.20	9.26
2017	5 847.70	14.71	4 303.28	19.01	1 544.42	9.02
2018	6 352.95	14.20	4 792.79	19.28	1 560.16	7.85
2019	5 431.15	12.21	4 193.23	16.78	1 237.92	6.35
2020	5 888.32	12.99	4 524.93	17.48	1 363.40	7.01
2021	7 479.28	12.81	5 681.75	17.13	1 797.53	7.12
2022	7 617.13	12.31	5 827.56	16.22	1 789.57	6.90
2023	6 663.78	11.43	5 012.21	14.83	1 651.57	6.73

注:数据来源于 WITS 数据库。

表2 2012—2023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  
进出口金额及中国所占比例

年份	美国向中国 出口额/亿美元	出口额 占比/%	美国自中国 进口额/亿美元	进口额 占比/%
2012	298.5	4.4	134.9	2.9
2013	352.3	4.9	145.8	3.1
2014	416.5	5.5	149.1	3.0
2015	468.2	6.1	156.3	3.1
2016	534.0	6.8	166.3	3.2
2017	561.3	6.7	181.3	3.3
2018	584.7	6.8	189.3	3.3
2019	594.9	6.7	198.4	3.3
2020	411.7	5.7	160.7	3.4
2021	396.5	4.9	217.6	3.8
2022	414.6	4.4	265.9	3.7
2023	467.2	4.6	201.4	2.7

注:数据来源于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14.20%、19.28%、7.85%降至2023年的11.43%、14.83%、6.73%，降幅分别为2.77%、4.45%、1.12%。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上升与美国占中国贸易比例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凸显美国对华经贸“脱钩”与“去风险”政策对中美贸易联系的负向冲击。

从服务贸易来看，2018年之前，美国与中国的服务贸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然而，自美国对华采取“脱钩”与“去风险”政策后，两国服务贸易联系逐步下降。2021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服务贸易仅为396.5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32.2%。此后虽有所回升，但美国对中国出口额依旧低迷。从进口来看，美国自中国进口在2020年降至低谷后，实现迅速增长，2023年达到201.4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6.4%。从贸易比重来看，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中国所占美国市场份额均呈现大幅下降。2023年，中

国所占出口和进口比例分别为4.6%和2.7%，较2018年分别下降2.2%和0.7%。

随着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联系弱化，中美两国贸易地位正逐级下降，2019年美国降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次于东盟和欧盟。相应而言，中国也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面对美国市场的收缩，中国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兴市场以及区域贸易伙伴（如东盟、非洲和拉美）。出口方面，东盟、俄罗斯、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出口支撑走强。其中，东盟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3年更是跃升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口方面，中国加大了从俄罗斯、东盟、巴西等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力度，特别是在能源和农产品领域。俄罗斯逐渐成为中国进口的重要来源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量显著增加。此外，巴西作为大豆和铁矿石的主要供应国，其在中国进口市场的份额也显著上升。

### 3.2 供应链合作存在“断链”之险

美国对华“脱钩”与“去风险”政策直接削弱中国与美国在中间品、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的产业链联系，中美产业链合作存在“断链”风险。在此过程中，中国加快产业链多元化布局，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 3.2.1 中间品贸易依赖性下降，供应链外迁加剧

中间品是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其贸易活动依赖于全球化生产网络。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长期以来在中间品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2023年，中国在全球中间品贸易总额占比为16.45%，相较于2018年的13.05%呈显著增长态势，证实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稳固地位。然而，

为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参与度,美国不断推进产业链“去中国化”,致使美国在华中间品贸易份额显著下降。如表3所示,2018—2023年,美国所占中国中间品贸易总额比例、出口比例和进口比例分别下降2.46%、3.46%和1.87%,中间品贸易份额的下降预警中美产业链合作存在“断链”风险。从产品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国中间品的贸易依赖显著降低。进口方面,美国在食品饮料、工业用品和零部件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大幅下滑,2023年进口比例较峰值相比分别回落44.85%、33.33%和27.92%。如表4所示。

出口方面,东盟(1.77%)、欧盟(1.56%)、俄罗斯(1.11%)、韩国(0.73%)等国家或地区的比例增长显著;进口方面,澳大利亚(2.49%)、巴西(1.63%)、俄罗斯(0.95%)、智利(0.71%)等国家

表3 2012—2023年中国对美国中间品进出口贸易比例

年份	贸易总额占比	出口额占比	进口额占比
2012	10.57	12.49	8.94
2013	10.43	11.87	9.18
2014	10.76	12.53	9.14
2015	11.05	12.99	9.19
2016	10.71	13.01	8.57
2017	10.75	13.41	8.41
2018	10.24	13.66	7.18
2019	8.54	10.93	6.31
2020	8.70	10.91	6.74
2021	8.59	10.63	6.70
2022	8.93	10.65	7.10
2023	8.29	9.95	6.54

注:数据来源于WITS数据库。

的比例提升明显。其中,中国与东盟的中间品贸易增加最为迅猛,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对华“脱钩断链”推动中国中间品在东盟进行转口贸易;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生产成本上涨,部分产业逐渐转移至东盟地区,通过提升与东盟的中间品贸易以实现生产加工。

### 3.2.2 制造业互补关系减弱,供应链重组加速推进

中美制造业贸易高度互补,美国依赖中国的低成本制造,而中国依赖美国的技术供应。然而,美国对华“脱钩”与“去风险”直接打破了这种互惠关系。一方面,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致使美国对中国制造产品进口的需求大幅减少。表5所示,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金额为4365.51亿美元,相较2018年下降1170.77亿美元。中国所占美国进口比例也从2018年的24.51%下降至2023年的15.76%。随着美国加快推动“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策略,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印度、墨西哥、东南亚地区成为美国采购的首选,上述国家对美出口规模强劲扩张,对中国出口形成“替代效应”。例如美国对食品饮料和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等制造产品的进口逐渐向东南亚地区转移。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不断在制造业领域推动对华设限、脱钩,致使中国对美国制造产品进口金额萎缩严重。2018—2023年间,中国制造业自美进口金额由1334.02亿美元下降至1249.86亿美元,下降6.31%。同时,美国所占中国进口比例也大幅下滑,2023年仅为7.86%。在中国对美国制造

表4 2012—2023年中国对美国中间品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比例

年份	食品与饮料		工业用品		零部件	
	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	中国从美国进口占比/%	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	中国从美国进口占比/%	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	中国从美国进口占比/%
2012	6.12	29.34	11.70	8.76	13.56	5.90
2013	6.01	26.12	11.38	8.46	12.50	7.70
2014	6.78	30.81	11.17	7.97	14.43	7.50
2015	6.48	27.70	12.21	8.68	14.08	7.23
2016	6.30	31.82	12.18	7.93	14.14	6.37
2017	5.94	27.61	12.68	8.06	14.38	6.30
2018	6.09	14.85	12.95	7.29	14.60	6.15
2019	5.37	13.21	10.71	5.47	11.25	6.65
2020	4.45	19.78	11.46	5.82	10.33	6.27
2021	4.82	22.85	11.03	5.80	10.18	5.68
2022	4.56	23.38	10.58	6.48	10.79	5.31
2023	4.29	17.55	9.63	5.84	10.39	5.55

注:数据来源于WITS数据库。

表5 2012—2023年中美两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额与贸易比例

年份	中国对美贸易 总额/亿美元	占比/ %	中国对美 出口/亿美元	占比/ %	中国对美 进口/亿美元	占比/ %	美国对华贸 易总额/亿美元	占比/ %	美国对华 出口/亿美元	占比/ %	美国对华 进口/亿美元	占比/ %
2012	4 525.84	14.44	3 510.08	17.35	1 015.77	9.14	5 069.78	16.95	692.19	6.21	4 377.59	23.33
2013	4 896.78	14.6	3 677.09	16.85	1 219.69	10.42	5 298.46	17.52	774.78	6.89	4 523.69	23.81
2014	5 238.60	14.82	3 957.70	17.10	1 280.90	10.50	5 587.97	17.84	790.81	6.99	4 797.16	23.99
2015	5 363.76	15.65	4 087.10	18.19	1 276.66	10.81	5 703.45	18.68	740.31	7.15	4 963.15	24.60
2016	4 981.69	15.61	3 840.56	18.58	1 141.13	10.14	5 450.44	18.46	711.25	7.30	4 739.19	23.95
2017	5 553.76	15.88	4 278.34	19.18	1 275.42	10.07	5 952.41	19.10	785.17	7.63	5 167.24	24.76
2018	6 099.47	15.66	4 765.44	19.42	1 334.02	9.25	6 294.02	18.79	757.73	6.94	5 536.28	24.51
2019	5 231.75	13.69	4 143.68	16.90	1 088.07	7.94	5 309.92	16.07	688.82	6.47	4 621.10	20.63
2020	5 553.82	14.07	4 457.44	17.60	1 096.39	7.76	5 211.21	16.86	749.73	7.97	4 461.48	20.75
2021	6 887.73	13.80	5 581.39	17.22	1 306.34	7.46	6 174.64	16.60	874.55	7.69	5 300.09	20.52
2022	7 024.52	13.41	5 701.21	16.25	1 323.31	7.66	6 500.19	15.38	861.95	6.69	5 638.24	19.19
2023	6 061.21	12.47	4 811.35	14.70	1 249.86	7.86	5 174.22	12.84	808.71	6.42	4 365.51	15.76

注:数据来源于 WITS 数据库。

产品进口贸易下降的同时,中国对世界制造产品的进口贸易却保持平稳,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产业的进口存在进口转移现象。数据显示,中国的进口贸易逐渐向印度尼西亚、越南、俄罗斯等国家转移,上述国家与中国的进口金额和进口份额均显著上升。

### 3.2.3 高科技行业“断链”态势明显

高科技行业作为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美国对华实施全面的封锁和围堵策略,致使中国高科技产品对美进出口贸易遭受重大冲击(表6和表7)。出口方面,中国高科技产品对美出口金额和出口比例均出现不同幅度下降。相较于2018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对美出口金额下降16.67%,对美出口比例下降28.94%。从细分行业来看,计算机通信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和光电技术对美出口金额下降,其他高科技行业对美出口金额均实现小幅增长。从对美出口比例来看,除了光电技术,其余高科技产品对美出口比例均大幅下滑。对比之下可以看出,计算机通信技术是受到冲击最直接、最大的行业,对美出口金额与出口比例相较于2018年分别下降20.85%和18.79%。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计算机通信技术等领域发展迅速,形成较强的技术优势。为在通信技术领域重掌科技霸权,无论是对华贸易战,还是如今的“脱钩”和“去风险”策略,美国主要针对的是计算机通信技术领域。

为减少技术转移,美国政府采取“小院高墙”贸易模式,全方位阻断核心技术、高端芯片等资源对华出口。2018—2023年,中国自美进口金额由54.27亿美元下降至42.40亿美元,下降21.88%。其中,航空航天、电子技术和计算机通信技术领域进口规模下降幅度最为明显,降幅分别达47.46%、32.62%和25.36%。其余高科技行业进口金额虽

然有所上涨,但金额较小。此外,受美国政府“长臂管辖”的影响,部分西方国家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减少或终止与中国的合作,损害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数据显示,中国从韩国、日本、法国、菲律宾等国家进口所占份额分别下降5.91%、0.85%、0.75%和0.58%。从进口比例来看,中国自美国进口比例也大幅减少。2018—2023年,中国自美进口比例由9.77%下降至6.94%,下降28.94%。然而,不同高科技行业自美国进口所占比例有所差异。其中,光电技术和材料技术自美进口比例大幅上升,2023年比例分别达10.66%和10.85%。其余高科技行业自美进口比例均呈现大幅下滑。从行业对比来看,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三种领域,中国自美进口比例相对较高,中国对美国依赖性较强,一旦美国有针对性“断供”将会严重波及航空产业的生产链条。

### 3.3 人才交流受限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在2012—2018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从23.6万人增加至37.3万人,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但自2018年起,美国政府通过收紧签证政策、限制部分学科的留学申请,导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呈现断崖式下滑。截至2022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降至28.9万人,同比减少约22%,赴美留学占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的比例也不断下降,2022年仅为43.73%,远低于2016年的64.42%。随着赴美留学人数的下降,中国学生更多倾向于国内或欧洲地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留学市场格局。

此外,美国政府对在中国留学人员在美国攻读专业进行一定限制,特别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导致中国留学人员在此类领域学习人数下降。例

表6 2012—2023年中国各类高科技产品与美国进口贸易

年份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		光电技术		计算机通信技术		电子技术		计算机集成制造		材料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2012	1.39	28.99	41.67	21.77	12.97	2.68	30.48	4.29	90.58	4.49	30.83	10.47	4.58	8.88	105.24	43.55
2013	2.53	32.65	49.61	2.88	13.01	2.71	38.49	5.53	167.23	6.93	34.62	12.80	3.43	7.97	167.82	55.78
2014	2.09	20.09	54.27	21.83	15.59	3.37	26.6	3.86	151.25	6.53	38.92	12.46	2.90	6.99	192.9	54.96
2015	2.37	21.05	61.81	23.37	14.66	3.53	22.75	3.46	144.18	6.08	41.19	14.01	3.46	9.39	195.89	59.55
2016	2.68	20.81	60.26	21.47	14.77	4.03	20.88	3.40	109.59	4.72	37.45	12.78	3.79	10.67	171.46	55.15
2017	20.69	27.36	51.07	19.03	16.6	4.55	21.3	2.97	124.26	4.74	41.25	11.06	3.83	10.02	187.15	53.83
2018	26.30	28.88	58.54	19.74	20.76	5.78	21.06	2.59	143.60	4.71	56.45	11.32	4.62	10.36	211.36	52.48
2019	27.11	23.10	56.23	16.68	18.04	5.98	15.34	1.94	160.74	5.34	55.48	12.83	3.86	8.47	126.03	41.13
2020	33.01	24.62	56.37	17.01	17.26	5.89	13.63	1.51	171.26	4.99	66.18	14	4.25	8.88	76.36	39.28
2021	41.74	23.27	67.39	18.08	18.50	5.44	13.12	1.13	186.55	4.50	82.40	13.96	5.32	8.92	72.52	32.69
2022	39.05	24.04	68.80	18.75	22.58	14.03	13.17	1.06	149.37	3.68	67.63	13.24	5.84	8.73	93.12	40.92
2023	30.58	16.95	70.10	18.94	26.94	16.44	14.19	1.23	107.18	3.18	58.11	10.58	5.83	10.85	111.06	43.21

注:数据来源于 WITS 数据库。

表7 2012—2023年中国各类高科技产品与美国出口贸易

年份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		光电技术		计算机通信技术		电子技术		计算机集成制造		材料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贸易额/	占比/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2012	0.51	10.83	34.41	16.94	28.27	7.08	1014.85	23.68	53.65	5.34	13.08	15.05	2.62	5.69	13.99	31.53
2013	0.73	12.04	38.58	17.60	24.11	6.06	1035.96	23.08	62.20	4.59	13.87	14.31	3.16	6.14	16.74	32.75
2014	0.75	11.51	38.82	16.67	25.64	6.97	1096.17	23.34	74.40	6.58	15.53	14.02	4.84	7.94	18.20	27.80
2015	0.71	10.26	40.37	16.99	28.52	7.86	1041.38	23.04	70.59	5.71	16.67	15.77	5.69	9.13	18.41	25.16
2016	0.68	10.58	42.03	17.54	26.18	8.40	985.45	23.50	58.92	5.41	16.92	15.55	4.25	6.76	18.88	26.38
2017	1.87	16.14	49.60	18.65	20.81	6.55	1175.52	25.07	51.65	4.43	19.79	15.70	4.47	6.16	19.29	26.74
2018	2.31	16.39	59.70	19.26	19.91	6.71	1318.80	25.49	54.08	3.86	21.92	15.48	5.50	7.33	22.09	24.35
2019	2.12	14.23	54.99	17.38	16.09	5.72	1123.23	23.46	49.97	3.07	17.08	11.89	4.40	6.36	20.61	23.31
2020	5.21	11.60	62.74	17.11	16.35	5.93	1167.59	23.38	51.22	2.85	19.22	12.83	3.62	5.09	12.36	19.12
2021	6.46	2.30	88.93	19.12	21.78	5.73	1343.56	22.83	57.68	2.43	24.46	12.61	5.66	5.65	14.65	21.44
2022	2.39	7.78	99.47	19.03	18.55	17.25	1292.96	22.72	69.99	2.73	29.26	12.71	7.78	5.82	20.39	22.84
2023	3.18	16.18	68.91	16.23	18.64	16.29	1043.89	20.70	65.86	2.84	27.93	10.67	6.68	5.32	18.43	17.61

注:数据来源于 WITS 数据库。

如工程学科领域,留学人员数量在2017年达到69 034人,但2022年仅有48 640人,下降29.5%。同样,在数学、计算机与科学领域,留学人员数量也从2019年的78 976人下降至2022年的67 170人,降幅约为14.9%。

### 3.4 双向投资尽显颓势

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采取更为严密的监管措施,导致中美两国双向投资互动遭遇阻碍,对外投资格局方面发生显著变化,其总观表现是中美之间双向投资尽显颓势。

根据 The US-China investment Hub 数据可知,2012—2016年,中国和美国投资总额呈上升趋势,2016年达624.7亿美元。但2016年之后,中美两国投资总额大幅下降,2020年仅为158.9亿美元,下降74.6%。

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来看,2019年是中国对

美投资“冰点”,仅为38.1亿美元。此后,中国对美投资水平虽然小幅增长,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总投资的比例波动下降,2023年该比例下降至3.9%。《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等法案的签署致使中国在美国设立的企业数量已经从2018年的5 500家下降至2023年的5 100家,降幅达7.3%。从行业来看,中国对美国大多数行业的投资均呈断崖式下降,高技术领域作为明显。例如,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中国对美投资峰值出现于2016年,为91亿美元。2017年降至12亿美元,此后投资均不足5亿美元。在自动化与运输设备领域也是如此,2020年中国对美投资仅为6.1亿美元,相较于2016年下降75%。

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来看,投资规模亦大幅下滑。2022年美国对华投资仅为22亿美元,对华投资量占中国利用外资的比例为1.2%,较2019年

下降0.7%。在行业层面来看,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在ICT领域,美国对中国的FDI于2016年达到峰值后迅速下降,2020年仅为4.96亿美元。在航空领域,美国对中国的FDI也由2016年的1.82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0.75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成为美国资本“回巢”的重点流出区域。

#### 4 中国的对策思路

协商谈判管控分歧,拓展中美合作空间。面对美国对华经贸“脱钩”与“去风险”行为,中国要坚守“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尊严及核心利益,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同时,中国应强调避免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秉持积极合作态度,致力于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争端,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化解分歧。如今,新兴技术蓬勃发展,中美两国作为难分彼此的“共同体”,双方应加强在技术领域合作,实现共赢,而非相互割裂。

深化对外开放,完善多边贸易发展。在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下,中国应积极地扩大开放,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一是推动多边区域体系建设。借助“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完善区域合作的标准和规则,推动多边区域体系建设;二是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在资金注入、技术转移、基础建设方面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贸易机会,以形成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三是主动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改革。通过提升经贸规则的话语权,积极倡导并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以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多边贸易体系。

推动国内市场建设,提高风险抵御能力。美国联合盟友共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给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带来严峻挑战,因此中国要不断加强国内市场建设,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第一,立足国内市场优势,不断扩大内需。不断推进国内市场建设,深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切实保障内需发展。第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不断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力和灵活度,以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第三,优化产业结构和供应链管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整体供应链韧性。同时,优化国内价值链分工,提高产业链的整体效率。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目前,中国关键核心技术薄弱,在部分领域易遭受“卡脖子”境况。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攻克关键技术难

题,提振薄弱产业发展。第一,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信息通信等领域,设立专项资金,创建科研平台,增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研发合作,推动知识技术交流共享。第二,加强基础和应用学科教育,提升基础研究核心力量。科技创新,人才为本,只有不断完善基础研究体制保障,引导多元主体和多方资源向基础研究领域聚集,大力培育基础性科研人才,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被“卡脖子”局面。第三,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新兴技术与产业经济的深度融合,构筑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传统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支持企业海外投资,大力吸引外商投资。目前中美投资尽显颓势,中国应大力支持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并广泛吸引外资。第一,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落实优化。虽然此协定未能改变美国对华资本审查力度,但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便利条件。第二,优化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环境。简化对外投资审批流程,创建鼓励跨国投资的政策环境,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制度障碍,促使企业加大海外投资。第三,提升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稳步推进资本高水平开放,拓宽外商投资的产业限制,吸引外商对华投资,并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支持外商投资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鼓励与国内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发。

#### 参考文献

- [1] 蔡宏波,郑涵茜,余天赐. 美国“去风险”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及应对[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1): 33-43.
- [2] RYAN M, STEPHEN B. The United States-China “tech war”: decoupling and the case of Huawei[J]. Global Policy, 2024, 15(2): 355-367.
- [3] HOU R, RUI H C. Co-evolutionary decoupling in EMNEs’ internationalisation: a Chinese bank’s journey of drifting apart from the US-led global financial system[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25, 60(1): 101596.
- [4] 渠慎宁,杨丹辉. 逆全球化下中美经济脱钩风险的领域与应对策略[J]. 财经问题研究, 2021(7): 102-109.
- [5] 陶文钊. 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J]. 现代国际关系, 2016(1): 19-28.
- [6] 张薇薇. 美国对华“脱钩”: 进程、影响与趋势[J]. 当代美国评论, 2021, 5(2): 42-57.
- [7] 吴心伯. 论中美战略[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5): 96-130.
- [8] HOUSE 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R]. Washington DC:

- White House Office, 2017.
- [9] 龚婷. 美国对华去风险论调用意何在? [EB/OL]. [2024-11-11].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3-06/21/content\\_88544045.shtml](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3-06/21/content_88544045.shtml).
- [10] BIDEN J.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EB/OL]. [2024-11-1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 [11] BIDEN J.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EB/OL]. [2024-11-1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 [12] 彭晓钊. 拜登政府“多变主义”政策转向下中美贸易摩擦走向 [EB/OL]. [2024-11-11]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70934](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70934).
- [13] TAI K. A conversation with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 [EB/OL]. [2024-11-1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nversation-ambassador-katherine-tai-us-trade-representative>.
- [14] NI V. Compete, confront, cooperate: climate summit test for Biden's China watchwords [EB/OL]. [2024-11-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apr/22/compete-confront-cooperate-climate-summit-test-for-bidens-china-watchwords>.
- [15] VON DER LEYEN U. Special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EB/OL]. [2024-11-1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32](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32).
- [16]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EB/OL]. [2024-11-1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 [17] THE WHITE HOUSE. 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e [EB/OL]. [2024-11-1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g7-hiroshima-leaders-communique/>.
- [18] ANTONY J. Blinken with Efi Koutsokosta of Euronews [EB/OL]. [2024-11-1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with-efi-koutsokosta-of-euronews-2/>.
- [19] 张哲. 从“脱钩”到“去风险”: 美国对华经贸科技政策的变迁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4, 8(3): 43-65.
- [20] 易继明, 陈孟麟. “开门迎客”: 应对美国“小院高墙”战略 [J]. 科学学研究, 2025, 43(2): 246-253.
- [21] 朱锋, 倪桂桦.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与困境 [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2(1): 1-18.
- [2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on executing a modern american industrial strategy by NEC director brian deese [EB/OL]. [2024-11-1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10/13/remarks-on-executing-a-modern-american-industrial-strategy-by-nec-director-brian-deese/>.
- [23]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EB/OL]. [2024-11-1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and Trade Decoupling and De-risk with China: Impact Assessment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ZHAO Chunlei<sup>1</sup>, LIU Zilin<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t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tai 255000, Shandong,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From “decoupling” to “de-risking”, the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has not fundamentally reversed, and its essence is still to curb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its own global hegemony. By combing the United States' measures towards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ocuses on the containment and suppression of China in the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financial fields, which leads to the weakening of Sino-U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link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market diversification. At the industrial chain level,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ace the risk of “chain breaking”,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decline of trade dependence on intermediate good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upply chain relocation, the weakening of manufacturing complementarit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especially in high-tech indus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limited, and the two-way investment is also declining. To this end, China needs to manage differences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expand the space for Sino-US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further deepen it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mprove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improve its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On this basis, China should gradually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ductivity,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at home and abroad.

**Keywords:** decoupling; de-risk; US policy toward China;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